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王柯平 胡继华 主编

跨文化研究

约翰·阿尔维斯 (John E. Alvis) / 文

莫亚萍 / 译

莎士比亚的政治

保罗·坎托 (Paul A. Cantor) / 文

黄兰花 / 译

李尔王：智慧与权力的悲剧性分裂

娄林

“当疯子引领盲人” (4.1.49)

——《李尔王》中埃德加的疯狂

姚云帆

“心”和“展开”：论《哈姆雷特》开场的
两个词语

吴小锋

立表测影与太极阴阳

欧根·里德 (Eugen Reed) / 文

胡继华 / 译

赫尔德，原始主义与诗的时代

吴明波 潘帅

终结与再生

——读布鲁门伯格的《神话研究》

TRANSCULTURAL
STUDIES

总第6辑
(2019年第1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跨文化研究

TRANSCULTURAL
STUDIES

总第6辑
(2019年第1辑)

王柯平 胡继华
主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跨文化研究》(Transcultural Studies) 编辑委员会

主办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顾问 乐黛云 刘小枫

主编 王柯平 胡继华

本期执行主编 黄薇薇

国内编委 (按照姓氏汉语拼音数字字母排序)

曹卫东 曹顺庆 常耀华 陈太胜 陈戎女 程巍
高建平 耿幼壮 郭刚 胡继华 黄薇薇 刘燕
裴登峰 潘先军 邱鸣 王红斌 王柯平 汪民安
谢寿光 杨乃乔 杨群 杨平 院成纯 张辉
赵京华 郑承军 周启超 周志强

国外编委

Timothy Bewes (美国布朗大学英语系文学批评教授)

Lionidas Bargeliotes (希腊雅典大学哲学系古典学教授,
奥林匹亚文化中心主任)

Rick Benitez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古典学教授)

Galina Tihanov (英国伦敦大学比较文学教授)

Thomas Robinson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和古典学教授)

本期编辑助理

朱凤娟 李盼盼 丁莉 康雨辰

目 录

· 学术焦点 · 莎士比亚导读 ·

莎士比亚的政治

…………… 约翰·阿尔维斯 (John E. Alvis) /文 莫亚萍/译 / 1

莎士比亚诗文的政治蕴涵及其对政治的超越

…………… 约翰·阿尔维斯 (John E. Alvis) /文 陈淑仪/译 / 41

李尔王：智慧与权力的悲剧性分裂

…………… 保罗·坎托 (Paul A. Cantor) /文 黄兰花/译 / 62

《亨利五世》与政制的合法性

…………… 蒂姆·施皮克曼 (Tim Spiekerman) /文 黄兰花/译 / 79

《理查二世》、布雷克顿与政治神学的终结

… 安塞尔姆·哈弗坎普 (Anselm Haverkamp) /文 林振华/译 / 107

· 经典解释 · 莎士比亚绎读 ·

“当疯子引领盲人” (4. 1. 49)

——《李尔王》中埃德加的疯狂 …………… 娄 林 / 120

“心”和“展开”：论《哈姆雷特》开场的两个词语 …… 姚云帆 / 134

莎士比亚笔下的爱欲

——析《奥赛罗》中的伊阿古 …………… 胡 稼 / 149

· 涵化之道 · 天文人文 ·

立表测影与太极阴阳 …………… 吴小锋 / 159

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哲学阐释 …………… 刘东梅 / 166

· 哲思寻踪 · 尼采的脉络 ·

赫尔德, 原始主义与诗的时代

…………… 欧根·里德 (Eugen Reed) /文 胡继华/译 / 173

永恒轮回与其身份建构

…………… 亚历山大·库克 (Alexander Cooke) /文 李露艳/译 / 192

对强力意志的批判

…………… 亨利·斯塔恩 (Henry Staten) /文 徐艺宁/译 / 211

· 新著评析 ·

终结与再生

——读布鲁门伯格的《神话研究》…………… 吴明波 潘 帅 / 231

《柏拉图的灵魂学》中译者序…………… 黄薇薇 / 238

比较视域下中德跨文化交流研究之硕果

——评高利克《从歌德、尼采到里尔克》…………… 袁 喆 刘 燕 / 244

Abstract…………… / 257

《跨文化研究》稿约 (Call for Papers)…………… / 264

莎士比亚的政治

约翰·阿尔维斯 (John E. Alvis) / 文

莫亚萍 / 译

摘要：政治是否存在本质？莎士比亚是否看到了政治的本质？政治实践是否存在普遍性，而莎士比亚是否向我们展示了其中奥秘？在当时的政治问题上，莎士比亚持有怎样的立场？我们能否通过研究他的戏剧来重现他的视野？这些问题的答案远远超越了纯粹的历史价值，甚至可以指涉当代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深入剖析莎士比亚戏剧化的政治，尝试通过分析其作品中政治—历史关系，探究如何阅读莎士比亚，如何在他的作品里探索政治合法性，以及如何历史图谱上辨析莎士比亚和马基雅维里面对类似议题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莎士比亚；政治的本质；马基雅维里；合法性

戏剧化的政治

尽管对永恒真理和永恒人性的怀疑如今已备受推崇，但被公认书写这些内容的莎士比亚仍然广受欢迎。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剧院里，或在各地最引人注目的影像演播厅中，这位在四百年前书写人类经验的诗人仍是一位无可争议的热门人物。“X一代”^①成群结队地去电影院观看《罗密欧与朱丽叶》——一部显然关于青涩之恋的作品。近年来，电影观众也青睐于莎翁的戏剧，从中体验失衡的家族关系（《哈姆雷特》）、种族主义（《奥赛罗》）、军事勇气（《亨利五世》）、友谊中的背叛（《我私人的爱达

^① [译按] 指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出生的美国人。

荷》，主人公是哈尔和福斯塔夫）以及暴虐的政治野心（《理查三世》）。^①

莎士比亚是公认的爱欲诗人，广而论之，他被列为人类灵魂学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一。然而，作为政治思想家或关注政治的作家，他却并不声名显赫。有评论家指出，“政治”这个词甚至从未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出现过。而“政治”一词，至少可以从表面体现一个作家对政治诉求的基本关注。^②事实上，直到20世纪初，“正统观念”仍认为莎士比亚对政治事务兴致寡淡。^③历史学家波拉德（A. F. Pollard）曾断言：“在英国文学史上，没有任何时期比英语语言臻至顶峰的时期更不关心政治，而对政治史唯一关心的问题而言，没有哪一位英国作家的态度比莎士比亚更模棱两可，更无足轻重。”^④

① 与莎士比亚“世界意识”相关的流行观点受到一些挑战和批评，主要来自当代颇有名气的学者。霍华德（Howard）和奥康纳（O'Connor）认为：

莎士比亚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之传播者的诸多主张，若在确保社会理解真理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被不合理地解读，那这些主张就会起到抑制作用。正如女权主义者和第三世界批评家等指出的那样，当文本被认为是为人类说话，这个“人类”的范围就会急剧缩小至传统特权阶层。本卷旨在质疑莎士比亚的世界意识，并揭示历史上的特定因素如何决定“莎士比亚”在批评界、课堂里和舞台上的表现。（Jean E. Howard and Marion F. O'Connor, *Shakespeare Reproduced: The Text in History and Ideology*, New York: Methuen, 1987, p. 4）

坎普斯（Ivo Kamps）认为，正是右翼势力延续了莎士比亚的普遍意识，而一些左翼人士则以揭露和质疑这种观点为己任：

右翼流行的观点是，莎士比亚超越了他的历史时代——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永恒——因为他的天赋让他捕捉到人性中最真实、最普遍、最持久的一面。然而，最近一波反批评浪潮将注意力集中在剧作家以剧本参与、颠覆或反思文艺复兴时期旨在压迫和控制人民的制度实践和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文化唯物主义者 and 女权主义批评家认为，除了更强的自我意识，这还是他们的重要使命。他们不仅要重新解读莎士比亚，还要重新解读保守的思想体系，正是这些思想体系悄然塑造了莎士比亚戏剧的传统研究方式。（Ivo Kamps, “Introduction: Ideology and Its Discontents,” in *Shakespeare Left and Right*,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 1）

② L. C. Knights, *Further Exploration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46, pp. 12–13.

③ Harold Jenkins,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1900–1951,” in *Shakespeare Survey VI*, Cambridge, 1953, p. 3.

④ A. F. Pollard,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scension of Edward VI to the Death of Elizabeth*, London, 1910, p. 440. 转引自 Howard B. White, *Antiquity Forgot: Essays on Shakespeare, Bacon, and Rembrandt*,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8, p. 44. 怀特（White）认为，对波拉德而言，“政治史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宪法问题，而“波拉德无疑提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莎士比亚在《约翰王》中并没有提到英国《大宪章》”。

但20世纪的批评家们，比如奈茨（L. C. Knights），则并不认为莎士比亚对政治漠不关心，“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描述莎士比亚的政治哲学”，因为“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不仅关心私密的个人关系，也关注人们公共的正式关系，所及之处包括权力和臣属关系、社会内部架构，以及公开行动的目的和手段……”。^① 克南（Alvin Kernan）或许对莎剧政治本质的认识更深：

在西方文学传统的著名作家中，没有谁能像莎士比亚那样一贯而又深刻地分析政治事务。他广泛描述宫廷和贵族生活，国家、法律、王权和王位继承都是他戏剧作品的主要题材。甚至其喜剧《皆大欢喜》和《暴风雨》也不例外，剧中人物的个体经历构成了戏剧的主题，而这些经历都发生在政治环境的框架内，既包括篡权，也包括复辟。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和悲剧中，这一点就更显著了：政治问题是其本质所在，国家的重要事务得到了极其精确而又深入的探讨。^②

布鲁姆（Allan Bloom）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位“杰出的政治作家”，他的历史剧尤其具有“政治复仇色彩”。^③

但除了《麦克白》这一显而易见的特例之外，人们耳熟能详的莎翁戏剧似乎都无关政治。如果简单描述《哈姆雷特》、《李尔王》或《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题，政治这个词可能并不会出现在第一段，更不用说出现在第一句了。可令人意外的是，哈姆雷特的确是一个回应政治行动的政治角色。在《李尔王》中，家族为继承遗产进行的争斗无疑饱含政治意味，因为他们讨论的遗产正是一个王国。如果不了解意大利的政治状况，就根本无法理解《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在意大利，权贵家族填补了无能的政体留下的权力虚空。罗密欧和朱丽叶欲爱不能、孽缘无尽，正是由于他们各自的家族在政治上相互倾轧，彼此憎恨：爱情成了政治的牺牲品。在《暴风雨》和《皆大欢喜》等剧中，情节也围绕着政治权力的盗用和滥用展开，但权力最终都回到了正当行使权力的人手里。

^① L. C. Knights, *Further Explorations*, p. 13.

^② Alvin B. Kernan, "Shakespeare and the Rhetoric of Politics," in *Politics, Power, and Shakespeare*, Frances McNeely Leonard (ed.), Arlingt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1981, p. 47.

^③ Allan Bloom, *Shakespeare's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 4. [译按] 中文文参见 [美] 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潘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莎士比亚有十部冠以英国政治家之名的历史剧，它们的主题如出一辙：谁来统治？虽然具体来说，它们是询问谁来统治13—16世纪的英格兰，但剧中情节基本都是政治情节，剧中行动，如暗杀、叛国、内战、侵略，并非英国独有，也非中世纪特有。人们自然要关注莎剧特有的历史背景，可如果就此断定他的每一部政变剧都独一无二，那未免太天真了。

请浏览一下近期颇有影响的莎士比亚研究书籍的标题吧：《莎士比亚左右》(*Shakespeare Left and Right*)、《政治的莎士比亚：文化唯物主义新论》(*Political Shakespeare: 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重现莎士比亚：历史和意识形态中的文本》(*Shakespeare Reproduced: The Text in History and Ideology*)。从这些标题来看，我们显然没有必要为莎剧是否与政治相关而争辩不休。现在，以政治视角解读莎士比亚的文本已成为主流批评圈的惯例。事实上，如今流行以政治解读所有作家，无论是奥斯丁(Jane Austen)还是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但如果所有文学作品都染色政治，这难免会冲淡莎翁作品里匠心独运的政治意味，甚至可能迎合某些观念，认为莎士比亚和其他作家别无二致，不过恰逢其时，他的戏剧只不过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他本人所处的时代。历史主义批评家认为，莎士比亚既与政治相关，又与政治绝缘。人们大可仔细研磨莎翁戏剧，为厌女症或亲女权主义、种族主义、启蒙的世界主义、反动的君主主义或新生自由主义寻找理据，但人们根本不会从中学到关于政治本质的知识，得到我们该持有何等政治立场的建议。比如，莎士比亚既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一个殖民主义者，但殖民主义本身就无异于邪恶。因此，新近的莎士比亚政治研究似乎更像寻找盟友或替罪羊，而不是寻找导师。

如果莎翁确无任何政治教义可以传授给我们，那么以上研究的确能自圆其说。但鉴于莎翁的地位和声望，有些人可能会仰赖他的权威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而另一些人则可能指出那些轻松的戏剧中蕴含着令人不快的政治和社会立场，从而对他人有所教益。然而，笔者将考虑另一种可能性：莎士比亚是这样一位作家，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重要的政治知识。或者阅读英国历史剧以填补蒂利亚德(E. M. W. Tillyard)所描绘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或者根据我们自己的政治信念来定位莎士比亚，都无须画地为牢、自设圈限。

当然，评论家们总试图辨明，莎士比亚在当时的政治问题上持有怎样的立场。他是为都铎王朝辩护吗？他相信君权神授的教义吗？他是一个伟

大的英格兰人，还是一个渺小的英格兰人？他对教皇的看法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远远超越了纯粹的历史价值。因为只要措辞恰当，它们都可以指涉当代的问题，例如政教分离或对外侵略的伦理论断。更具挑衅意味的是，如果一个聪颖如莎翁的人当真认为统治者的权威归于上帝，那么这至少会鼓励某些读者重新思考关于政权来源的自由主义观念。

尽管莎翁对我们感兴趣的政治问题可能也感兴趣，但笔者想更广泛地研究一下，关于政治的本质，他对我们究竟有何教导。然而，政治有本质吗？换言之，政治实践是否存在普遍性，而莎士比亚是否向我们展示了其中奥义？如果政治领域边界分明，政治实践只在熟悉的既定边界内展开，从过去到未来一贯如此，那么，莎士比亚与当代人及其难题之间的历史间距就可以忽略不计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是否看到了政治的本质，我们能否通过研究他的戏剧来重现他的视野。

林肯（Lincoln）承认，他“和任何非专业的读者一样频繁地阅读”莎士比亚的几部戏剧。他喜爱的这几部戏剧（《李尔王》、《哈姆雷特》、《麦克白》、《理查三世》和《亨利八世》）都围绕着明确的政治主题详细展现了政治野心与道德良知的冲突：“我认为《麦克白》无与伦比。它太美妙了。”^①这可能只是林肯总统的美学评价，但不难推测，《麦克白》的意蕴的确令他回味无穷：他发现，戏剧化的政治世界竟与他所处的真实世界有几分相似。虽然林肯获得权力的方式比麦克白体面，但他显然也是一个心雄万夫之人。参议员道格拉斯（Douglas）曾暗示，林肯有鸿鹄之志，当下的立场仅仅是最终成为总统的跳板而已。林肯则回应说，“[敝人确乎]极度自私”，但“[同]道格拉斯法官相比，乃小巫见大巫也”。^②林肯对《麦克白》的钟爱或可看作一位19世纪的总统对莎士比亚的认可，仿佛莎翁超前理解了他所面对的一切。

如果说政治抱负是政治生活的普遍特征之一，那么“合法性”的概念

① Letter to J. H. Hackett, August 17, 1863, from *Abraham Lincoln: His Speeches and Writings*, Roy P. Basler (ed.), Cleveland: The World Publishing Co., 1946.

② “你可能会说，道格拉斯法官也暗示过同一件事，即与奴隶制度相关的种种困难仅仅出于那些求官者和野心勃勃的北方政客的宣传。我估计，他这是认为我们想取代‘他的位子’。我承认，我们之中确实有政治掮客。《圣经》说我们在某些方面极度自私，我想即使没有《圣经》，我们也能发现这一事实。我并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不比平常人，但我认定我并不会比道格拉斯法官更自私。”（Lincoln's reply to Senator Douglas at Alton, October 15, 1858. *The Lincoln-Douglas Debates*, Robert W. Johannsen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31）

就更是如此了。“合法性”是英国历史剧最突出的主题。在这些戏剧中，利害攸关的不仅是“谁将统治”，而且是“谁应统治”。两者之间的差别正源自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所指出的：“对统治的热望实在……太剧烈，不仅注入了有权统治者的心胸，也同样填充了那些无权统治者的心房。”^①合法性，即正当地获得和使用政治权力。只要那些不应拥有权力的人对权力虎视眈眈，合法性问题就始终悬而未决。笔者将要解读的戏剧中，大半都充斥着对权力的热望——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都不是合法的统治者。而这恰恰表明，与尊重合法性相比，政治抱负之勃发更加凶猛。历史表明，上列诸位绅士概莫能外：那些已具有过度政治野心的人，往往不怎么讲中正合度。

为避免过早让读者对莎翁笔下的国王产生偏见，笔者应该说明，“极度自私”的人能够并且也会追求正义，而“合法”的权力也可能被滥用。恰当行使权力是莎翁历史剧中贯穿始终的主题，这并不排除野心，也未必暗指合法。谁应该获有权力，如何正当获取权力，如何最好地行使权力，这些都是笔者即将分析的莎翁戏剧中隐微而又深刻的问题。这都是一些根本问题，无论在莎翁的时代还是在我们身处的现代都同样值得关注。

政治和历史

假如笔者所言非虚，莎士比亚的确是一位政治作家，那么现代读者可能会对他在历史剧中考察的政治图景感到疏远、陌生。莎翁应对的是君主制^②，而我们则是自由民主主义政制。在莎翁时代，基督教主宰政治，现在则不尽然。普遍来说，在莎翁的历史剧中，政治意蕴在某些方面比如今狭窄。诚如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言：

在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是关于权力争夺、派系斗争、阴谋和战争的政治，而不是关于政党组织和有纲领的运动、反抗和改革、激进意识形态和革命的政治。与政治秩序本身或权力斗争相比，改革

^① Niccolò Machiavelli, *The Discourses*, Father Leslie J. Walker (trans.), Bernard Crick, Harmondsworth (eds.), England: Penguin Classics, 1986, III.4, p. 395. [译按] 中译文参见〔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所引该书文本均参此译本，为行文一致，个别译词有改动，不再一一注明。

^②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关乎世袭君主制，但他的其他戏剧也涉及古代和现代的不同政体。

和革命的历史相对短暂。客观评价现行制度，有规划地表达政治不满与抱负，组织积极人士参与持续性的政治活动，这三者都只是现代政治的要义，或者毋宁说是后中世纪政治的若干截面而已。^①

我们难以界定约翰王的“意识形态”、理查二世的“计划”或亨利五世的“共同利益的愿景”，因为这些术语在莎士比亚所描述的政治世界里完全不存在，甚至连历史剧中充斥的战争和叛乱也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领土之战主要指贵族之间、昏聩国王的‘强大臣民’之间的混战。叛乱则往往只是无权的农民或无产者绝望而又愤怒的起义，无助且毫无章法，只有最简陋的计划而已。”^②

笔者并不是说，缺乏意识形态诉求的权力政治在现代世界里寂寞无闻；而是认为，对于莎士比亚和他的观众来说，那种政治模式才是正常的、普遍的，它虽然在现代世界鲜为人知，在当时却运行无阻，甚至受人推崇。那时候，“野心”和“征服”可不是贬义词。尽管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描绘的政治图景并不具备沃尔泽勾勒的现代意义上的“纲领性”或“意识形态性”，但他的政治图景还是受到普遍原则的制约。读者若在历史剧中只看到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也可以谅解，但这些斗争既然都在既定的政治语境下发生，了解一些历史背景还是大有裨益的。

合法性问题在16世纪以最切实可行的方式呈现，即服从或不服从。里布纳（Irving Ribner）认为：“催生历史剧的主要政治因素……就是政治顺服。反抗合法君主在什么时候正当过？”^③ 1571年的布道书《反对不服从和

① Michael Walz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

② Michael Walz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 p. 8.

③ Irving Ribner, *The English History Play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318; 也可参见 Richard Strier, “Faithful Servants: Shakespeare’s Praise of Disobedience”, in *The Historical Renaissance*, Heather Dubrow and Richard Strier (e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 104; “下级对社会和政治上的上级的服从是否有限，这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思想的重大问题之一。”里布纳对16世纪政治思想的精要总结（pp. 309 - 318）对接下来的段落很重要。更多相关内容请参见 J. W. Alle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1928; John Neville Figgis,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Michael Walz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especially III. X. “The Problem of English Machiavellianism: Modes of Civic Consciousness before the Civil War”; E. M. W. Tillyard, *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43.

任意造反》(*Against Disobedience and Wilful Rebellion*) 给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答案是：从未。^① 按照这本布道书的说法，顺服是“一切德行中最主要的德行”，因为天父对亚当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顺服。撒旦是最初的造反者，反抗是最初的罪恶。布道书指出，在《圣经》中，善良和邪恶的国王都由上帝的意志统治。邪恶的统治者和善良的统治者一样合法，可以将其理解为上帝对人之原罪的惩罚。总会有一些人不喜欢他们的国王，但如果他们有权反抗，反抗就会屡见不鲜。布道书总结说，谋反者是邪恶的，邪恶之人无权批判他们的国王：

成为顽劣的臣民是多么不值当的事啊，他们大多数会走向反抗，走向邪恶，批判他们的君主，批判他们的政府，批判他们的参赞，从而确定哪些是好的、可容忍的，哪些是恶的、不能容忍的，进而去忤逆……叛乱者比最坏的君主更坏，叛乱比最坏君主管理的最差政府更坏……^②

若说这份布道书提供了一份实际的指导，告诉臣民什么时候应该（永远）服从统治者，什么时候（永远不）反抗统治者，那么在它的背后，则隐含着一份踌躇满志而又一丝不苟的对人类关系本质的解析。政治绝对主义者认为，宇宙是有等级的，这种等级也彰显在人类关系中：

人类被认为是不平等的，他们的不平等经常被直接比喻为宇宙等级制度。巨大的关系链中有一系列小的关系链……其中一个小关联既对应着动物与神，也对应着人，这种看法难免出现……关于地位和阶层的封建等级制度似乎是对宇宙关联的完美效仿……宇宙关联的等级在人类关系里简单复制，人类社会建立的秩序与和谐和宇宙中普遍存在的秩序与和谐精确雷同。^③

① 斯特瑞尔 (Richard Strier) 称这个布道书为“一篇才华横溢之作”，参见 Richard Strier, “Faithful Servants: Shakespeare’s Praise of Disobedience,” in *The Historical Renaissance*, Heather Dubrow and Richard Strier (eds.), p. 108.

② Irving Ribner, *The English History Play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 p. 313. 布道书引自 John Griffiths (ed.), *The Two Books of Homilies Appointed to Be Read in Churches*, Oxford: The University Press, 1859.

③ Michael Walz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 pp. 155 - 156.

政治关系，或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只是世界结构的一种反映而已。因此，政治秩序效仿宇宙秩序，取决于每个人恰当理会自己的地位和阶层，这自然分割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简单来说，也就是老生常谈的一组术语——“秩序和等级”：

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必须有等级，因为没有其他方式。“如果事物与人井然有序，就意味着他们之间有等级之分。秩序正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人们的生活由地位和阶级决定：只有在这种形式下，人们才能生活在一起，并在安定与和平中建立关联。^①

然而，也有异议指向政治绝对主义的政治信条和等级制度的形而上学。里布纳认为，虽然绝对主义“在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占统治地位，是最响亮的政治信条……但我们决不相信这是被普遍接受的。宣扬一遍又一遍，其激烈程度恰恰表明，英国人民亟待被说服”^②。政治理论家波奈特（John Ponet）在1571年的著作《政治权力简论》（*Short Treatise of Politicke Power*）中抨击了“被动服从”的概念。波奈特认为自然法则，即上帝的法则，由理性决定；但由于人易堕落，不能单靠理性来约束自己，于是上帝便赐予人政府和法律。波奈特还认为，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代替人类堕落的理性，从而使人与神的律法和谐共处。然而，对于政权应采取哪种形式的问题，上帝是中立的。这关键的一点应当由人民决定，因为政府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设的：

因此，上帝赋予政府政治权力，让政府分配和控制它认为合适的东西。因而是政府，而不是上帝，建立民主或君主制。若是君主制，君王效忠政府，政府效忠上帝……君王若德不配位，百姓可以废去所立给他的权柄。邪恶的君王必须被废黜，暴君必须被处死，这是自然规律。^③

与此同时，波奈特和其他人对政治专制主义也提出质疑，“秩序和等级”的

① Michael Walz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 p. 158. 中间引语出自 Hooker's *Ecclesiastic Polity*, Book VIII.

② Irving Ribner, *The English History Play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 p. 314.

③ Irving Ribner, *The English History Play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 pp. 315 - 316.

概念受到怀疑。如沃尔泽所说：

16世纪的英国人特别关注能体现社会可变性的历史事实……这反驳了整个和谐的、等级森严的世界观。谋反者、篡权者、征服者、暴君——所有这些都成为16世纪思考和戏剧再现的对象。宇宙关联链几乎已经无法再解释这一切：他们是非自然的、畸形的，然而所有人类历史都传授他们意义。儿子可能弑父、弑君……清教徒作家，虽使用许多传统的形象，使之看上去类似霍布斯的自然观，却扩大了恶念，制造了混乱的描述。如果混乱亦是自然，那就不存在宇宙的关联之链了。^①

16世纪对合法性的理解主要是服从。“谁应统治”的问题变成“什么时候人民应该顺服”。对于后一个问题，绝对论者和反抗论者各执一词，但对于前一个问题，两方几乎没有异议：君主制是唯一的现实选择。于是，紧要之处就在于是否应该服从国王，而不在于是否应该设立国王，或者，更长远地来看，不在于宇宙究竟有序还是混乱。然而，关于宇宙秩序的哲学思辨仍然以下列方式侵入现实政治：如果世界，尤其是社会和政治世界，不是等级分明的，那么由谁来统治、反抗是否合法，就成为有待商榷的议题。正因如此，莎士比亚才在历史剧中对合法性进行探讨。在关注政治权力斗争的每一部戏剧中，莎翁笔下的统治者和即将成为统治者的人提出各种主张，竭力解释为什么理应由他们而不是别人来统治。在莎翁戏剧中，即使最自私的人物也不单追求权力：他们追求的是合法的权力，因为这更稳当。因此，究竟什么构成了合法的政治权力，如何获得这种权力，是莎翁笔下的人物迫切关注的问题：合法性问题自然会从戏剧行为中呈现。我们读到的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约翰王或阿瑟王、理查二世或波林勃洛克、亨利四世或霍茨波——他们都希望在现实的政体中获得统治的权力。

如何阅读莎士比亚

据上文的分析，将莎士比亚作为政治作家来读，虽有道理，却不足为

^① Michael Walz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 pp. 158 - 159.

训。尽管历史语境不同，莎翁仍能传授给我们一些关于政治的教义。大多数当代政治评论家（虽不专指，但笔者特指新历史主义者）认同这句话的前半部分，但否认后半部分：莎士比亚可能是“政治的”，但他没有教给我们什么；他也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们的，因为他生活在政治刚刚萌芽的无关紧要的时代。也许不难在历史版图上确立莎翁的政见，但我们没法领悟他的微言大义。

新历史主义学派在当代莎士比亚批评流派中如日中天，它将莎士比亚置于历史背景中辨析他的政治观点。笔者却意在揭示莎士比亚的政治教义，其中便涉及莎翁对历史的运用。他们运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并求诸历史来诠释莎翁的戏剧，但笔者的研究方法全然不同。尽管新历史主义是一场复杂多样的运动，但马克思主义谱系学的痕迹让人一目了然。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新历史主义者专注历史，对人类生产（在本语境中指文学生产）做出决定论的解释，并提出平等主义的政治承诺。尽管在笔者看来，他们的历史决定论和政治承诺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朗，但在新历史主义者对莎翁戏剧的解读中，我们总能发现这两种倾向。

一位友善的评论家认为，“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的基本方法”是“将文本视为历史久远的政治产物”。^①对新历史主义者而言，文学文本与特定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文本出自历史语境并反证它，两者是从属与决定的关系：“他们不遗余力地将文学文本置于社会历史中，因此将文本置于被决定的次要地位。”^②文学文本被定义为由环境决定的对象，这些批评家的努力功不可没，他们突破了指涉文本外部影响（传记和历史）的寻常做法，强调文学作品的文本意义。对新历史主义者来说，文学文本是历史文献，是当时主流社会和政治观点的可靠反映。这是历史相对论所认可的：人类是环境

① Edward Pechter, *What Was Shakespeare?: Renaissance Plays and Changing Critical Practi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7.

② Edward Pechter, *What Was Shakespeare?: Renaissance Plays and Changing Critical Practice*, p. 59. 同一页继续补充:

我们可以讨论这一论断的范围和灵活性，并根据我们的意愿保留或赋予价值。我们也可以讨论新历史主义者声称没有将文本附属于社会历史语境之下的目的或意图。他们在愚弄读者，还是成功地愚弄了自己——或者不论是其中哪种情况，它们为何发生？不过，依赖的理念毋庸置疑。如果新历史主义者放弃这个理念，他们就完全丧失了对读者的忠实。

的产物，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皆为幻象。这意味着莎士比亚只能书写他自己的时代，无法为其他时代代言。

异议显然存在，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历史语境是简单且单向的，很难辨析作者可能反映的单一语境究竟是什么。对此，新历史主义者有一个有趣的答案：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为主导思想形式服务。^① 异端或颠覆运动也不例外——轰轰烈烈，却并无真正的颠覆性。坎托（Paul Cantor）释之：“对任何体系的反抗实则是体系内部运动的重建，因此彻底的反抗正是正统观念的铁证。”^② 这一福柯式的定律 [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称之为“颠覆与遏制”] 可能是历史主义者批判人类自主性的必然结果，却无法说服其他不接受历史主义批判的人，且看坎托如何幽默地加以说明：

弗洛伊德认为，如果你说你恨父亲，你的确恨他；但如果你说你爱父亲，那么你也是恨他。新历史主义认为，如果你说你支持正统，你的确支持它；但如果你说你攻击正统，那么你也是支持它。^③

依此类推，人们便可断言，莎士比亚是都铎王朝正统政治的典型代表，他的任何反对正统的言论事实上都佐证了正统。

新历史主义者将莎士比亚的戏剧视作历史文献，认为其反映了莎翁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和义务，这并不是—种客观、科学的方式，而是一种有力地支持他们自己观点的政治信念。新历史主义相对论的新颖之处，正在于这种政治承诺：

传统的莎士比亚批评家似乎学术兴趣偏狭，只关注莎士比亚和他同时代人的思想与我们有何不同……伊丽莎白时代的人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而我们则认同民主。对于传统的历史主义者来说，这只是不同时代的不同思考方式。传统的莎士比亚学者似乎并没有产

① 莱文（Richard Levin）认为，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在“历史语境”一词中“几乎总是（意指）以阶级或性别定义的某种‘权力’的概念”。参见 Richard Levin, “The Problem of ‘Context’ in Interpretation,” in *Shakespeare and the Dramatic Tradition*, Elton and Long (eds.),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89, p. 92.

② Paul Cantor, “Stephen Greenblatt’s New Historicist Vision,” in *Academic Questions*, Fall 1993, p. 25.

③ Paul Cantor, “Stephen Greenblatt’s New Historicist Vision,” in *Academic Questions*, pp. 30–31.